

中  
华  
学  
术  
与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丛  
书

① 主 编 \ 张岱年  
① 副主编 \ 邓光东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隋唐佛學

与中国文学

● 陈引驰 著

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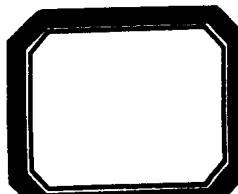
# 佛学与中国文学

●陈引驰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主编 \ 张岱年

●副主编 \ 邓光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 / 陈引驰著 . . . .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1

(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 - 80647 - 339 - 4

I . 隋 … II . 陈 … III . 佛教 - 影响 - 文学 - 中国 - 隋唐时

代 IV .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052 号

**书 名:**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张岱年

**本书作者:**陈引驰

**丛书策划:**朱光甫

**责任编辑:**朱光甫

**封面设计:**梅家强

**版式设计:**吴晓晓

**责任印制:**宗 勇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2 万

**版次:**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2.00 元 **ISBN** 7 - 80647 - 339 - 4/I · 237

---

**邮政编码:**330002

**电话:**0791—8503450

**网 址:**WWW.BHZWY.COM

**传真:**0791—8512655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作者小传

**陈引驰**，1966年生于上海。1984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6年为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1996年始任副教授。1999年至200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任教期间担任中国古典文学及学术思想史方面的课程。学术兴趣主要在道玄思想脉络、中古佛教文学以及近代学术流变等。



## 内容提要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逐渐融入了固有的传统中，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中国文学亦因佛教的影响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创：从语词的扩张，到情节的袭取，乃至形式的移植、想像的丰富等等，这一切都给中国文学印染上种种斑斓的光彩。佛教与中国文学发生接触、关联，最有声色的阶段是在六朝、隋唐的中古时代，而从最初的冲撞到最后的融会也是在这一时段内完成的，尤其在唐代，这一进程达到了光辉的顶峰。本书聚焦于此一时期，构画了唐代文士在儒、佛、道三者间的浸润与抉择、禅风变迁中诗人的姿态以及烙印于文学中的痕迹；还特别讨论了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变文等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深刻关联，力图展示出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

# 总序

张岱年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是为诸子时代。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经学成为官学，是为经学时代。魏晋之世，玄谈盛行，以《老》、《庄》、《易》为三玄，是为玄学时代。之后，佛教逐渐发展起来，至隋唐之时，佛学有高度发展，而儒门淡泊，是为佛学时代。北宋时期，理学兴起，批判了佛学与道家，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理论思维有进一步的发展，经历元明，是为理学时代。到明清之际，许多学者批评理学的空疏，趋向于考证之学，是谓朴学时代。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到二十世纪，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想，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

中华学术，根据传统的说法，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这是举其大要而言，还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天文历算、兵法、地理、医药、农学等等。但是义理之学、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占主要地位。词章之学即文学，包含诗、赋、词、曲，与一般民众关系较为密切。各门学术是互相影响的。词章之学

HHB3/05

亦受到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影响。研究历代文学与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的关系，是有重要意义的。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主要研究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以及近代西学东渐对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文学风格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等方面的影响，阐释各时代文学的特色及其发展过程，这是有重要意义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希望我为丛书写一总序，于是略述中华学术的源流作为弁言。

一九九七年八月 于北京大学

##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周易与中国文学
- 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
- 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
- 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
- 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
- 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
- 清代朴学与中国文学
- 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

## 郭延礼

### 著述 目录

#### 一 独著

- |                  |         |            |
|------------------|---------|------------|
|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
|                  |         | 1990—1993年 |
|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998年      |
| 《中国近代文学新探》       | 中州古籍出版社 | 1989年      |
| 《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9年      |
| 《秋瑾文学论稿》         | 陕西人民出版社 | 1987年      |
| 《秋瑾年谱》           | 齐鲁书社    | 1983年      |
| 《秋瑾研究资料》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87年      |
| 《龚自珍年谱》          | 齐鲁书社    | 1987年      |
| 《龚自珍》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1999年      |

#### 二 选注

- |           |         |       |
|-----------|---------|-------|
| 《秋瑾诗文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82年 |
| 《龚自珍诗选》   | 齐鲁书社    | 1981年 |
| 《近代六十家诗选》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1986年 |
| 《徐自华诗文集》  | 中华书局    | 1990年 |

#### 三 主编和合著

- |                 |         |       |
|-----------------|---------|-------|
| 《爱国主义与近代文学》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92年 |
| 《中国历代诗歌选》(高校教材)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79年 |

# 目 录

---

<b>第一章 晋隋文学之佛影鸟瞰 .....</b>	(1)
第一节 佛教传布与士僧交往.....	(1)
第二节 山水到声律之佛教影迹.....	(9)
第三节 隋之佛教与宫廷文学 .....	(32)
<hr/>	
<b>第二章 唐诗人的佛教抉择:佛道关系角度 之观察 .....</b>	(43)
第一节 李白:道宗佛影之诗人.....	(51)
第二节 白居易:出道入佛的归宿.....	(82)
第三节 李商隐:浮世无常的锐感 .....	(101)
<hr/>	
<b>第三章 禅学流变中的诗人:王维、柳宗元、 白居易 .....</b>	(121)
第一节 王维:南北禅交替之际 .....	(121)
第二节 柳宗元:新禅风的抵抗者 .....	(151)
第三节 白居易:洪州禅的实践者 .....	(162)
<hr/>	
<b>第四章 古文运动与儒佛关系 .....</b>	(181)
第一节 古文之提倡与儒佛并重.....	(182)

---

第二节 韩愈反佛之突起与理据	(193)
第三节 儒释调和：柳宗元与李翱	(209)
<hr/>	
第五章 唐民间佛教诗歌传统	(224)
第一节 王梵志诗的民间性	(225)
第二节 王梵志诗中的死亡主题	(239)
第三节 寒山诗的时代与特质	(257)
第四节 寒山诗的两种境界	(277)
<hr/>	
第六章 敦煌变文的佛教缘起	(299)
第一节 拟名的变化与“变”“变文”之义	(299)
第二节 体制特征之佛教缘起	(314)
第三节 讲经的发展与变文转变	(334)
第四节 变文的佛教题材与特色	(352)
<hr/>	
第七章 志怪传奇之佛教渊源	(358)
第一节 故事题材与佛教观念	(358)
第二节 从“烈士池”到“杜子春”	(373)
<hr/>	
主要引用与参考书目	(400)
后记	(412)

# 第一章 晋隋文学之佛影鸟瞰

## 第一节 佛教传布与士僧交往

佛教大约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其势初时尚弱，汉魏时代大抵只有些微痕迹而已。而且，对于佛的认识暧昧不清，对于佛教义理的了解就更谈不上了。当时人以为佛法与黄老之术等齐，可以凭以延年益寿、获致福祉。《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记载汉光武之子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桓帝在宫中并设黄老、浮屠之祠，襄楷借机上书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传》）这是以清虚无为统涵释、老。而当时人对于佛教法力的具体理解可以由《牟子理惑论》中见出：

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

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障，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

显然将佛看成奇异的神人了。这时起直到公元三世纪，佛教对于中国上层士人的影响微乎其微。<sup>①</sup>

而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影响的逐渐深入，其主要的媒介正是热心学佛、向佛的士人。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之中，士人是文化思潮主要的自觉传承者，只有当士人亲近乃至认同了佛教，佛教的文化因素才会在中国文化的主流中产生作用。

佛教虽早于两汉之际已传入中国，然而要说它真正进入中国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士大夫的心灵产生影响，实在两晋之际。明代何良俊曰：

佛氏之教，自东汉末流入震旦，遂芽蘖于此矣。其初犹未蔓延，然其道实清虚玄远，士君子之性资高旷，易为所染，不觉浸浸入于其中。至晋氏，一时诸胜流辈，喜谈名理，而佛氏之教奕奕玄胜，故竟相宗尚。如王丞相父子、谢太傅叔侄、刘尹、王长史、郗嘉宾、许玄度诸人，与支道林、竺法深、法汰、于法开、法冈诸道人，往复论难，研核宗本，其理愈

---

<sup>①</sup>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第一章第三节曾提及：“在最早的佛教传记如《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僧人在公元290年以前与有文化的中国上层阶级产生联系的例子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而在公元3世纪末、4世纪的僧传中，这样的事例数目却在不断增加。”至于记载当时历史的主要的著作《晋书》“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有关士大夫和王室佛教的资料，但在有关王朝前半阶段的章节中，甚至间接提到佛教的文字都极少”，《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乃至《世说新语》中这一时段的情形也一样。参该书中译本第94~9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为精深，而佛教始大行于中国矣。（《四友斋丛说》卷二一）

正是在这时，佛教开始在士人间产生了反响。彼时之名僧与名士交往频密，如支道林就是《世说新语》的核心人物之一<sup>①</sup>，而慧远之与陶渊明、谢灵运等文士的交往虽然或有虚饰的成分，但也是历来流传不已的故事。这些现象表明，那时的佛教已经不再是以往囿于自身宗教范围内的存在，而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的知识氛围和文化存在了。

魏晋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学。玄学的发展以曹魏正始年间为第一高潮，王弼、何晏为其代表，其学源自经学，侧重于《易》而发衍于《老子》，王、何均有相关著作：何晏尝与人论《易》（《三国志·魏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又著《论语集解》，原拟作《老子》注，因遇王弼论《老》而让一头地，转而成《道德论》（《世说新语·文学》）；王弼注《易》、《老》，又有关于《论语》的论述（《论语释疑》）。竹林玄学是为第二阶段，七贤渐渐转重《庄子》：阮籍著《通易论》、《通老论》外，有《达庄论》；嵇康曾与向秀论《庄子》；后向秀注《庄子》，“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到西晋时，郭象之《庄子》注更广而衍论，玄学在义理上已臻完善。

晋室东渡，旧玄学之论题未有新进，“言尽意”、“声无哀乐”、“养生”等承前代余绪而已<sup>②</sup>，即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所谓“江

① 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中曾经提出：“以支遁为例，《世说新语》作为传记史料至少与《高僧传》一样重要。在 28 个与《高僧传》密不可分的短故事中，仅有 8 个未出现在《世说新语》或注所引的书中。另一方面，《世说新语》中不少于 82 段文字写到或提及支遁，其中大部分在《高僧传》中没有相应的文字。”见该书第三章第 154 条注，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中译本，第 249 页。

② 《世说新语·文学》：“王丞相过江，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其新义在于佛理的加入，檀道鸾《续晋阳秋》所云“至过江佛理尤盛”（《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是也。这时的玄学掺入了佛教的新成分，而佛教也玄学化了。两股思想潮流的聚合使玄学名士与佛教高僧的交往空前密切起来。

东晋初，士人与学问僧的交往相当频密。如竺法深，原为士族，往来琅琊王座间，有人嘲讽地问他：“道人何以游朱门？”他回答：“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世说新语·言语》）他确是一位与君王重臣往来的好手，清谈领袖王导、庾亮也都与之有交往；当后来的年少气盛者对他有非议时，他曾摆出前辈的口吻：“黄吻年少，勿为评论宿士！昔尝与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世说新语·方正》）与士人贵戚的来往是僧人名声的一个重要因素了。竺法汰之名重也是因王导之子王洽的尊礼：

初，法汰北来，未知名。王领军供养之，每与周旋。行往来名胜许，辄与俱，不得汰，便停车不行。因此名遂重。  
（《世说新语·赏誉》）

又有一位康法畅，也如玄谈名士，手持麈尾，“生值名宾，辄清谈尽日”（《高僧传》卷四《康僧渊传》）。他的麈尾柄极好，引得庾亮问他，这玩艺儿这么好，何以长在？法畅答：“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世说新语·言语》）还有一位康僧渊，“本西域人，生于长安，貌虽梵人，语实中国”（《高僧传》卷四《康僧渊传》），东渡之初，也默默无闻，因与殷浩谈理而知名：

康僧渊初过江，未有知者。恒周旋市肆，乞索以自营。忽往渊源许，值盛有宾客。殷使坐，粗与寒温，遂及义理，语

言辞色，曾无愧色，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是知之。

康僧渊与殷浩所谈，兼及“佛经深远之理”与“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高僧传》卷四《康僧渊传》）。此所谓“俗书”，当以指玄学书如《庄子》之类，《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载慧远讲经时引《庄子》使“惑者晓然”，于是道安就此特许慧远“不废俗书”；至于“性情之义”，当即玄学中才性之同异离合、圣人有情与否一类论题）。名士与名僧交往稠密，熟悉了于是也会开玩笑，王导与康僧渊的对答就非常有趣：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

佛教界与士大夫交往最为密切、最具影响力的当推支遁，他与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李充等名士结成一集团，《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名士间交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谈玄，支遁置身其间，概莫能外，而他确是以深于《庄子》闻名的，早年就有关于《逍遥游》的注说<sup>①</sup>，《世说新语·文学》记其以对《逍遥游》的新解折服王羲之的故事，很有意趣：

<sup>①</sup> 见《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逍遥论》。许理和推测这一著述完成在340—343年他初次在居都中之时，《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第187页。

王逸少(羲之)作会稽，初至，支道林(支遁)在焉。孙兴公(孙绰)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否？”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可未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遙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解襟披带，留连不能已。

其他著名高僧也有同样的情况。慧远“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卷六《慧远传》)，他在致刘遗民的信中回忆自己由儒而玄的转变时说：“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他的归依佛门尚在其后：“以今而观，便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广弘明集》卷二十七)所以当后来他讲经因为听众难以理解时，才能“引《庄子》义为连类，于是惑者晓然；是后安公(道安)特听慧远不废俗书”(《高僧传》卷六《慧远传》)。同样，鸠摩罗什的高足僧肇，早先也是历观经史，志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的；只是后来得读《维摩诘经》，顶受欢喜，知所依归的(《高僧传》卷六《僧肇传》)。正是由于他们深厚的玄学修养，与士大夫才有深入的精神联系，得以进入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乃更进而熏染文士趋向佛教。汤用彤先生曾简明扼要地指出了这一点：

自佛教入中国后，由汉至前魏，名士罕有推重佛教者，尊敬僧人，更未之闻。……而东晋名士崇奉林公(即支遁)，可谓空前。此故不在当时佛法兴隆，实则当代名僧，既理趣